“政法：中国与世界”丛书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北大-重大）
中山大学政治哲学与英美宪政研究中心

主　　编：甘　阳　赵晓力　强世功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甘　阳　田　雷　刘　晗　苏　力　陈端洪
赵晓力　欧树军　凌　斌　章永乐　强世功

助理编辑：徐　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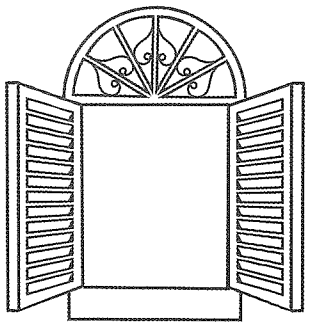
Beyond Electocracy

Rethinking Democracy

选主批判

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

王绍光 主编　欧树军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V. Bogdanor, *The New British Constitution*, Oxford (2009).

W. F. Murphy,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a Just Political Order*, Baltimore (2007).

W. Nelson, *The Origins and Legacy of Judicial Review*, Lawrence, KS (2000).

W. Nippel, *Mischverfassungstheorie und Verfassungsrealit? t in Antike und früher Neuzeit*, Stuttgart (1980).

W. J. Tatum, Roman Democracyä R. K. Balot (ed.),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 Malden, MA (2009).

超越选举威权主义:非民主体制的光谱*

理查德·斯奈德**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第三波民主浪潮已经遭遇了强烈的非民主回潮。过去30年中,转向民主的国家数量之多的确史无前例,但非民主体制仍在世界上大量存在。比如,稳固的极权主义或后极权主义政体仍牢牢掌控着朝鲜、古巴、老挝和越南等的权力。君主制在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和约旦长期存在。[1] 利比亚、津巴布韦和多哥则是个人独裁制。神权制、一族统治和军事政体则在伊朗、叙利亚和缅甸控制权力。此外,很多国家经历了政治体制变化过程,但并未产生民主制。在利比里亚、柬埔寨、索马里、阿富汗和扎伊尔,政体变化导致了国家崩溃和持续内战。在其他地方,包括本书所分析的很多国家,政体变化催生了新的非民主政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人们欢欣鼓舞翘首以盼的"民主胜利"远非现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因此将其研究重心从民主转型转向当代非民主政体。

---

* 本文译自 Richard Snyder, Beyon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he Spectrum of Non-Democratic Regimes, Forthcoming in Andreas Schedler, e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ynamics of Unfree Competition*,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6), pp. 219—231。

** 布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作者感谢 Gerardo Munck 的评论以及 Jason Brownlee 和 Ellen Lust-Okar 的有益建议。

〔1〕 中东持续稳固的非民主体制,see Bellin (2004), Lust-Okar (2005), and Posusney and Angrist (2005)。

这一转变需要我们处理一个关键的概念难题：如何超越仅仅透过民主棱镜研究政治学的旧范式。本书作者们迈出了重要一步，他们与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所说的“转型范式”宣告决裂。[2] “转型范式”主导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体制比较研究，根据这一研究视角，很多国家处于自由民主制与成熟威权主义之间的“灰色地带”，被称为有保留的民主制，它们正走在迈向彻底民主制的康庄大道上。与之相比，本书作者们既不把这些灰色地带国家看作民主国家，也不认为它们正在转向民主。作者们不再把这种体制视为“带修饰词”的民主制，比如“不自由的民主制”（Zakaria 1997）或者“半民主制”（Case 1996），相反，他们称其为带修饰词的威权主义，称之为选举威权体制。[3] 这一标签变化，意味着一种超越转型范式的重要范式转变。

尽管理论范式已经转变，但在尝试理解各色非民主体制上，世界政治的研究者们仍然面临一系列关键的待解难题。我在本章指出，日益涌现的当代非民主体制文献，和民主体制文献一样，都把重中之重放在选举过程上，因而忽略了对于分析体制至关重要的其他基本维度。只聚焦于选举有两大不足。首先，它导致人们对选举的政治后果实际上取决于选举与关键**非选举**因素之间的互动视而不见。为了避免这一缺陷，我强调政治体制比较研究长期传统中的四个常用非选举维度：（1）谁统治？——政党精英、领袖个人、军队还是神职人员。（2）统治者如何统治？——通过庇护网络、种族纽带还是大众政党。[4]（3）统治者为什么统治？——出于贪婪、种族仇恨还是宗教或意识形态使命。（4）统治者多大程度上在统治？——也就是说，是否有人在统治，如果有，其统治程度又如何（也即“国家管控度”）。[5] 其次，非民主体制研究过度强调选举竞争，导致人们非常难以理解当今世界上一大批政治体制，它们缺乏民主最起码的点缀。理解非民主体制的全面谱系，需要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框架，这就需要超越晚近文献对选举政治和竞争的狭隘聚焦。

谁统治？统治者如何统治？统治者为什么统治？以选举为背景

在很大程度上，“有选举的非民主体制”的命运受几方面因素的影响，如统治者类型的不同（比如军队、领袖个人或政治党派），统治者实施统治的方式（庇护网络、种族纽带或是大众政党），以及统治者追逐权力的动机（比如贪婪、宗教或意识形态）。因此，要想理解这种体制如何运作和演化，我们就需要考察选举过程和非民主统治的其他维度之间的互动。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简单比较一下军事体制和个人体制的选举过程。

军事体制与个人体制的选举机制不同。当权者有枪炮，反对者没有，这是大多数军事体制的选举与其他非民主体制的选举的一个基本差异。[6] 军事体制的统治者直接控制强制工具，所以他们扭转选举所启动的变革进程的能力，比其他体制的统治者更强大。[7] 实际上，即便在竞争选举中**落败**，军事统治者也仍然可以保持权力，比如1990年的缅甸和1992年的阿尔及利亚。[8] 在这些个案中，竞争选举、当权者在选举中落败，并未产生民主化，反

〔2〕 For a related challenge to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see the symposium on “Elections Without Democracy” organized by Larry Diamond (2002) in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3〕 On “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 see Collier and Levitsky (1997).

〔4〕 选举也是非民主体制用来维系控制的工具（Hermet 1982; Schedler 2002b）。然而，即便如此，选举也不经常举行，所以选举并不是非民主统治的“日常形式”。

〔5〕 关于非民主体制类型的比较好的文献综述，参见 Brooker (2000: esp. Ch. 2)。国家特性维度一直不大算是早期体制研究的核心关注，一个重要的例外，参见 Linz and Stepan (1996)。

〔6〕 虽然军事体制还没有灭绝，但二战结束以来这种体制已经大大减少。当代非民主体制的这种去军事化，在研究文献中没有得到足够关注，这很可能是因为：(1) 国际环境有利于民主统治的生长，军事统治的不正当性增大：军事统治是最明显的非民主统治形式之一，以及 (2) 1950—1970年代赋予许多军事体制正当性的“国家主义—发展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1990年代不再那么行之有效了。也有人在论证国家主义经济干预的回归是否最终用于军事力量政治作用的再正当化，比如在整个拉美。

〔7〕 当然，也不能想当然地认定军事体制彻底垄断了各种强制手段：1960—1970年代拉美南锥体能力强大的官僚—威权体制，就遭遇了武装游击队的叛乱。

〔8〕 在技术上，阿尔及利亚的体制属于国家自由阵线领导的一党体制。然而，军队的作用在1992年已经变得非常核心，所以最好称之为军事—一党混合体。在1992年的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赢得两轮选举中的首轮，军队立即介入，结束了该国的首次竞争选举试验。

而导致非民主体制再次获得平衡。[9] 要理解这一结果，我们就要聚焦于**谁统治**：由于一个有凝聚力的军事组织统治着缅甸和阿尔及利亚，当权者虽然败选却得以存活，继续保有权力。

与军事体制相比，个人体制下的统治者并不总是直接控制强制手段：这取决于统治者的庇护网络对军事力量的渗透有多深，军事机关也许有能力在行动上与统治者保持自主性。[10] 比如1986年的海地和菲律宾，在广泛社会危机到来之际，军队在推翻个人独裁者上扮演了核心角色。菲律宾的情况尤其有趣，导致军队背叛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的危机，恰恰正是这个独裁者决定“提前选举”所促成的。[11]

然而，聚焦于选举本身，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有自主性的组织会背叛统治者：选举竞争也许会刺激心怀不满的精英变节，但不能解释一批不满的行动者最初为什么会出现。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先聚焦于**个人体制如何统治**这一议题——也就是说，通过一个庇护网络统治。因为他们依靠庇护网络统治，个人统治者通常用他们的密友、亲属和被保护人填满军事力量和其他政府部门的最高领导职位。这会形成一个让职业军官、干部和官僚不满的“裙带玻璃天花板”，因而可能催生一大批倾向于在危机时期背叛体制的离心精英。比如，在菲律宾，大约10%的军事官员是军队改革运动组织的成员（reform the armed forces now movement），对马科斯任人唯亲表示不满的军官建立了这个组织。[12] 在公众普遍对马科斯在1986年2月“提前选举”期间舞弊和使用暴力愤怒不已之际，大约300名来自军队改革运动组织的军官发起了旨在推翻这名独裁者的军事政变。政变失败了，但它鼓励了数万平民，他们在天主教会动员下，站出来组成了人体盾牌，来保护这些叛变军官。这一“人民力量”的展示导致了一场军事背叛浪潮，马科斯终于在三天后离开了这个国家。[13]

正如菲律宾的马科斯被推翻所展示的，选举竞争会刺激那些体制内的不满人士，促使他们最终背叛统治者，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形成这么一批心怀不满的精英。因此，要理解为什么面临选举时某些个人体制会出现内部分裂，就需要我们超越选举，选举也许只是这种分裂的触发点，我们需要考虑是政治权力的基础结构，也即庇护网络，是否会产生一批准备在危机时期推翻统治者的失意行动者，比如菲律宾的军队改革运动组织。

此外，关注**统治者为什么统治**，即关注权力的**目的**，也有助于解释非民主体制各种危机的不同后果，无论这些危机是否与选举相关。[14] 个人统治者很少以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名义统治。他们更常受贪婪驱动。[15] 因此，在面对危机时，他们可能比神职或极权主义统治者更愿意放弃权力，而后两者是为了他们愿意为之献出生命的“事业”而统治的。相比之下，如果他们的瑞士银行户头足够大，如果获得海外安全港保障，个人统治者会愿意放弃权力。让—克洛德·杜瓦利埃（Jean-Claude Duvalier）离开海地到法国平安度日，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离开巴拉圭到了巴西，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离开扎伊尔到摩洛哥，以及更近的例子，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离开利比里亚到了尼日利亚，这些都说明了这个可能性。不过，如前塞尔维亚统治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例子所示，通过国际刑事法庭追究前独裁者责任的新国际规范使这种可能性下降了：统治者为什么统治（也即权力的目的）不再与预测哪个统治者会和平放弃控制权相关。随着作为“退休独裁者”在流放中舒服过日子的可能性消失，甚至受贪婪驱动（而非社会转型的乌托邦视野驱动）的统治者也会拒绝离职，除非受武力所迫。

---

〔9〕 体制再平衡这一概念来自 Linz (1978)。

〔10〕 Snyder (1992) and (1998).

〔11〕 对菲律宾民主转型最好的分析是 Thompson (1995)。关于选举对菲律宾、伊朗、马来西亚和埃及非民主统治者命运的影响，精彩的比较研究参见 Brownlee (2004)。

〔12〕 Buss (1987); Bonner (1988, 372).

〔13〕 Bonner (1988).

〔14〕 Thompson and Kuntz 发现，“在决定个人体制面对选举挫败时如何作为上，个人主义的程度比个人体制到底是选举威权主义还是完全封闭的威权主义更重要”。

〔15〕 Chehabi and Linz (1998).

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在统治？选举与国家管控度

除了把非民主统治的手段和非民主统治者的动机视为选举的背景以外，当代非民主体制的研究者们还应该聚焦于选举如何与另一个非选举维度互动：即国家统治属地的程度，或者国家管控度。非民主背景下的选举可以和对国家管控度产生两种决然相反的影响，在有些情况下它可能削弱国家能力，在另一些情况下增强国家能力。反过来，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能有效统治国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选举过程本身。

削弱国家管控度的选举。尽管在一些非民主体制中选举可能纯属花瓶，但有时它们会严重影响现有体制的稳定。因此，正如安德烈亚·谢德勒（Andreas Schedler，2002b：49）所强调的，选举既可以“维系体制”，也可以“颠覆体制”。[16] 实际上，选举在非民主体制中的力量甚至可能超过选举威权主义研究者的一般想象：除了影响体制的稳定性，选举还可能影响**国家**的稳定性。比如，在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和海地，选举都推动了国家的崩溃，因此，可以视为削弱国家管控度的选举。与之相比，在西班牙，选举扮演了把整个国家凝聚在一起的重要角色。[17] 这类案例进一步说明，在分析非民主体制的选举和其他貌似民主的点缀时，不能与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割裂开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需要探究国家管控度如何影响选举，反过来，选举又如何影响国家管控度。

海地最近发生的事凸显选举竞争如何导致国家崩溃。在海地，立法机构选举作弊以及对总统选举的抵制导致政治僵局，这是国家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在2000年的立法机构选举中靠欺诈获胜，随即又连任五年总统，他集中精力压制唯一拥有国际正

[16] 选举如何成为帮助现任非民主精英们保持权力的一个重要工具，参见 Hermet（1982）。

[17] 俄罗斯、前南斯拉夫和西班牙选举与体制机构之间的互动，参见 Linz and Stepan（1996）。

当性的反对组织：由温和精英组成的“选举反对派”，这些人原本愿意接受选举博弈规则，却在2000年立法机构选举欺诈后抵制阿里斯蒂德再次竞选。非常讽刺的是，阿里斯蒂德压制温和精英的策略，强化了武装叛乱者的力量，后者最终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领土。此外，1995年，阿里斯蒂德解散军队，并把警察队伍“家产化”（比如安插密友担任警察首长，让警察力量效忠于自己个人），都使得武装反对派的力量进一步强化，后者由被解散的海地军队前成员和过去一直效忠于阿里斯蒂德的戈纳伊夫“食人族军”等准军事力量组成。这些武装组织得益于（1）海地脆弱的强制机构（没有军队，警察力量规模小、装备很差）；（2）海地没有能力控制与多明尼加共和国长达200英里的边境线（很多叛乱者在这里避难休整）；（3）温和反对派的虚弱（阿里斯蒂德压制措施是他们虚弱的原因之一）。由于国家管控度十分低下，由2000年抵制选举行动引发了阿里斯蒂德当局与非暴力的温和反对组织之间持续对峙，最终导致海地的国家解体，滑向2004年的内战和混乱。由此证明，非民主体制举行的选举可能产生颠覆国家的后果。

没有国家的选举？如果选举在崩溃国家与内战状态下举行，如1997年的利比里亚和1996年的塞拉利昂那样，权力不会发生**让渡**，因为并没有可用的国家机器供选举的获胜者驾驭。[18] 选举不过是**确认**战争获胜一方对领土、人民和资源的控制权。因此，“没有国家的选举”的胜选者为了进行统治，必须构筑自己的权力基础，比如士兵、行政人员等等。

在崩溃国家，通常与选举关联的现象，诸如政党、多元主义和竞争，其意义都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参与选举竞争的“政党”是军阀领导的武装组织；“多元主义”指的是境内形形色色的武装组织；“竞争”靠的是子弹，而不是选票。在这类案例中，如果聚焦选举，就会忽视更具根本性的东西，即不同武装组织之间针对领土和资源控制权的竞争。然而，奇怪的是，因为有选举，一些观察家把利比里亚和安哥拉这类内战和崩溃国家称之为“霸权式选举威权主

[18] 关于利比里亚人的选举，参见 The Carter Center（Nd）。关于没有能力的国家机关作为民主与非民主体制的一个关键维度，参见 Linz and Stepan（1996）。

义政权”(参见 Diamond 2002：30—31)。此外，由于国际观察家们发现崩溃国家的选举相对干净公平，“自由之家”甚至将这类案例划入值得尊重的“部分自由”类别；例如塞拉利昂 2001 年的政治权利指数得分为 4，公民自由指数得分为 5。[19] 即使把这类案例界定为选举型威权体制也毫无意义：国家都不存在，哪来的政权体制？无论有没有国际认可的竞争性选举，都改变不了这一点。我们不能基于某些貌似与民主相关的点缀(如选举)来界定这类案例，值得重视的反倒是其低下的管控度，这是更为基本的问题。

“封闭体制”的黑箱内部

聚焦于非选举因素不仅对理解举办选举的政治体制是必要的，而且对描述进而区分当代非民主体制的全面光谱是必要的。谢德勒(2002b：37)指出自由民主与封闭的威权主义之间存在“模糊地带”，近来不少人试图对处于这个地带的政治体制概念化，这有助于理解后冷战世界体制的多样性。然而，不幸的是，过分关注有选举的混合体制已经导致人们忽视了那些缺乏起码民主点缀的大量案例。尽管研究模糊地带是有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忽视完全没有任何民主点缀的所谓“封闭体制”掌控的黑暗地带。

忽视黑暗地带，已经导致削足适履地把索马里和沙特阿拉伯这些独特案例硬塞入无所不包的“封闭体制”类别。这一类别实际上有几个严重缺陷。首先，封闭威权主义类别把大量非常独特的案例混在一起，包括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体制(如越南、古巴、朝鲜和老挝)，神权体制(如伊朗和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苏丹制(如文莱)，非传统的个人体制(如土库曼斯坦和利比亚)，传统君主制(如斯威士兰、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军事体制(如缅甸)以及一族统治(如叙利亚和布隆迪)。

“封闭威权主义”标签也瓦解了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体制之间的重要差异，从而与之前的非民主体制研究割裂开来，这既不必要又事与愿违。[20] “封闭威权主义”标签，把基于大众动员和意识形态的体制和其他类型的体制混在一起，比如朝鲜、越南、古巴，也许还包括 2003 年美国入侵前的伊拉克。同样，“封闭威权主义”掩盖了军事与个人体制之间旧分类的重要差异。总而言之，用封闭威权主义这个类别来划分缺乏最起码民主点缀的非民主体制，会与过去的政体类型学割裂开来，因而更加难以获得关于世界政治的累积知识。

“封闭威权主义”标签的最后一个缺陷在于，它把那些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话说“政府能够治理”的国家(如越南)与那些政府不能治理或政府根本不存在的国家(如索马里、刚果、利比亚、塞拉利昂和卢旺达)混在一起。亨廷顿(1968：1)有句名言，“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不在于政府形式，而在于政府管治的程度”。封闭威权主义没有区分缺乏政治秩序的崩溃国家与秩序**太多**的极权体制。在那些管治水平很高的国家，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是稳定且可预期的[21]，而在军阀、强盗和混乱支配下的地方完全缺乏可预期性。实际上，在国家崩溃之地，讨论政体毫无意义，更不必说什么封闭政体了，因为“封闭”这一隐喻错误地暗示只有当权统治者有资格获得权力。在国家崩溃背景下，更恰切的比喻是一扇**假门**，就像一个电影道具，这扇门后面没有真正的建筑物：它不通向任何地方。如果假定“封闭”政体可以通过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而“开放”，那么通过这个“开放入口”的获胜者将不会获得权力，因为没有任何国家机关可以让渡权力。[22] 同样，在国家制度崩溃的地方，那些所谓封闭体制的“内部人”绝不会凭借其位置而获得权力，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国家机构存在。他们能做的只能是创造自己的权力资源和基础结构。因此，在没有政府的国家，胜利的叛军无法通过掌握该国的强制机构和行政机构而统治，因为根本没有这类机构供其接管。把这种

〔19〕“自由之家”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指数都是七分制，一分表明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程度很高。

〔20〕对于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体制的差异，最常引用的是 Juan Linz (1964, 1975)的研究。

〔21〕实际上，对于很多极权体制的牺牲品来说，甚至死亡也或多或少是有序、可预期的。

〔22〕“获得权力”与“行使权力”这一区分如何用于阐明政治体制的概念化，参见 Mazzuca (Forthcoming)。

国家称之为封闭体制，毫无意义。

有两条通往黑暗地带之路，对比鲜明且易于识别：政治太过有序（如朝鲜）和政治太过无序（如刚果）。事实上，缺乏一套具备彻底、普遍强制能力的国家机器，可以部分地解释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2002：26）的下述观察："自由在世界上稳健全面地崛起"可以部分地从"最具压制性、自由平均分为6.5和7.0的国家数目与比重萎缩看出"。[23] 结果，在2001年，像塞拉利昂这样的崩溃国家自由平均分为4.5，而朝鲜得分为7，因为该国有能力彻底压制政治与公民自由。[24] 不过，2001年的塞拉利昂是个混乱和无政府主导之地，是个国家生活接近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的地方，说此时的塞拉利昂比朝鲜更"自由"，真的有意义吗？

根据"封闭性"来区分政体，已经证明并不令人满意，因为：（1）它与之以前的非民主体制概念框架割裂开来，使之更难产生关于政治世界的累积知识；（2）忽视了更重要的其他维度，尤其是国家管控度，这些维度对于成功描绘当今世界各类政体至为关键。

结论：未来之路

尽管选举竞争是很多当代非民主体制的显著特征之一，我们不应该夸大选举的重要性。首先，很多非民主体制缺乏选举或者其他民主特征。其次，即便是在那些有选举的非民主体制中，选举竞争对于这些体制命运的影响也取决于各种非选举因素。再次，正如民主体制研究者日益强调的，民主制本身绝不仅仅是选举。[25] 因此，要理解后冷战时代的政治体制光谱，就需要一个超越选举过程的概念框架。在本章中，我采取两个步骤来建构这一框架。首先，我说明了四个与选举竞争互动的关键维度，从而确定各个维度如何影响非民主体制的命运——谁统治？统治者如何统治？统治者为什么统治？

[23] "自由平均分"是一个国家在"自由之家"政治权利指数和公民自由指数的平均值。这两个指数均为七分制，得分为一表明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程度很高。

[24] 关于国家能力如何塑造非民主体制的统治能力，参见本书卢肯·韦（Lucan Way）文。

[25] See, for example, O'Donnell (2001).

以及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统治？其次，我打开了"封闭体制"的黑箱，表明聚焦于管控度而非"封闭性"对理解这些体制提供更为坚固的根基。

未来应采取什么步骤来加强我们对非民主体制光谱的理解？首先，在我们提出新概念框架之前，我们需要更好地评估各种现有框架。由于最近那些非民主体制类型研究把重点放在这些体制带有的民主点缀（即选举和政治对抗）上，它们往往未能与以前的非民主体制类型研究挂钩，后者关注的重点在于谁统治、统治者如何统治以及统治者为什么统治。这种与既有知识储备的分离，经常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据说是为了证明后冷战时代的各种非民主体制非常特殊，因此不符合这些原有的分类，需要新概念去描述和理解这些体制。然而，脱离前人努力去进行非民主体制的概念化代价高昂：概念断裂给理论建构和知识累积制造了一个严重障碍。由于这些概念创新的成本非常高昂，审慎是必需的。

要想实现知识累积的最大化，需要在概念形成方面保持一种**保守的偏见**。我们应该抵御宣称发现新政治动物，并对之予以命名和分类的那种自然主义诱惑。我们不能为了在观念市场上大捞一把，不管三七二十一急于杜撰新词，我们应该首先认真评估下述"零假设"：当代非民主体制实际上**并未**新颖到足以支撑任何新分类和标签的程度。即使这一"零假设"证明为谬，我们仍需要尽可能抢救和保留过去的概念设计。无论如何，在合理主张一种新类型或次类型之前，人们需要积极认真地评估之前的概念化努力。否则，我们就很可能犯概念健忘和概念混乱的错误，这会阻碍体制研究上的知识累积，更糟糕的是，会引发知识损失或知识缩减。

为了避免概念遗忘，不妨回到一个有助于更好理解当代非民主体制光谱的出发点，即胡安·林茨（Juan Linz，1975）那个相当有影响力的政体分类，它也堪称现代社会科学涵盖政体多样性最全面的努力。林茨的类型学围绕三个核心维度建构：（1）多元主义的程度；（2）动员的程度；（3）意识形态的程度。[26] 林茨的三个维度对于理解30年后的非民主体制还有用吗？建构新

[26] 林茨丰富复杂的分析还包括很多其他维度，比如哪些组织被排斥在外或者被允许加入体制，但这三个维度是最主要的。该分类的修正版把苏丹制和后极权体制单列，而非作为威权主义的次类型，参见Linz and Stepan (1996)。

类型需要新维度吗？如果需要，这些新维度可能是什么？

聚焦于多元主义的程度显然仍然可用于分析当今非民主体制的内部变异。实际上，多元主义维度已经吸引了注重研究现代非民主体制那些民主点缀（比如选举对抗和竞争性）的学者们的全部注意力。与之相比，林茨的另两个维度即动员和意识形态被严重忽视。当今世界上明显的动员体制很少，这从表面看来似乎支持了下述倾向：排斥动员和意识形态，专注于多元主义。歌曲和盛典装点的群众集会、一眼望不到头的正步军队游行、大众政党等等动员形式是20世纪法西斯主义等体制的特征，除了朝鲜之类少数残余的例外以外，似乎已经绝迹了。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危机”导致动员体制在表面上陆陆续续死亡了，或者至少是中断了——大众政治动员毕竟需要意识形态。尽管如此，正如林茨本人告诫的那样，宣布动员和意识形态的终结仍然可能是不成熟的。今天，新一轮动员体制浪潮最可能的候选人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实际上，不管是在民主或非民主政体下的反对组织那里，都可以发现各种“反西方”意识形态，从中东和亚洲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到各种拉美本土运动派系（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墨西哥非常显著），都在寻求政治与文化“自主”，以回应被本土民主政治排斥在外和外国公司对自然资源的榨取。现在还不清楚，这些反对派组织是否以及如何赢得权力，同样不清楚的是如果它们赢得权力，它们会建立什么样的政权。除了这些强烈的反西方意识形态，更为软化的反西方思想可以在“亚洲价值”中发现，“亚洲价值”旨在赋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发展型威权体制正当性。软性反西方主义的另一个例子，可以从委内瑞拉查韦斯体制的民族民粹主义中发现，后者已经显示了对城市贫困居民的强大动员能力。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把后冷战时代视为后意识形态、后动员时代是错误的。

如果林茨1975年区分的三个核心维度，即多元主义、动员和意识形态仍然有很大作用，那理解当代非民主体制的光谱还需要什么新维度吗？冷战结束后，失败国家和崩溃国家的扩散，尤其是在非洲，显然指向下述维度——国家管控度。这一维度突出了政治权力和权威在领土的不均匀分布，进而开始重点关注次国家型非民主体制，范围从地区性专制暴君（如次国家型苏丹

制）到更制度化的次国家型权威主义飞地，比如印度和墨西哥一些地区的国家和地方政党机器。对政治体制进行领土分解和地理差异分析，人们就可以捕捉核心中央政府管控度的差异，以及次国家层级的统治形式差异，这将会增进我们对当代非民主政治的理解。[27]

最后一个值得考虑的维度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如何影响非民主分子夺取并维持政治权力。不管在民主体系还是非民主体系中，信息都是控制或政治权力的一个关键方面。虽然已有少数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研究“电子民主”，比如聚焦于电子投票，以及公民如何通过互联网站和电子邮件与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互动[28]，但“电子威权主义”的研究几乎完全不存在。考察现代非民主体制如何利用监控技术的新进展维系自己的统治可能会大有斩获（也就是说，就“统治者如何统治”而言）。新加坡在公共电梯和浴室悄悄安装传感器和摄像头，可能非常类似奥威尔的老大哥噩梦。由于监控技术迅速微型化、成本也急剧下降，可以想象更多的非民主统治者也可以玩得起新加坡式的无孔不入的监控。[29] 新信息技术，尤其是电子邮件和网站，也可以让统治者更容易传播其政治宣传，从而在国内外培植支持力量。

对于非民主政治的研究者来说，新信息技术另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手机、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站如何增强反民主的**反对**组织的能量。比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所运用的在线“虚拟动员”，可以用来部分地替代20世纪大众反民主运动游行集会。[30] 利用互联网传播人质斩首，已经证明是伊斯兰叛乱分子的小型组织对全世界受众传递其“信息”的有效方式。民主政治的研究者已经富有成效地探究了现代沟通技术，尤其是电视，如何改造了大众政党；非民主政治的研究者也可以通过考虑新技术如何影响非民主反对组织

[27] 次国家型权威主义体制的分析研究策略，参见Snyder（2001）。

[28] 比如，关于电子民主，参见West（2005）。

[29] 民主体制下的国家也强化对公民的监控。比如，为了控制犯罪，与当局连接的视频摄像头广泛覆盖了威明顿闹市区。

[30] 任何一个偏好争鸣的社会科学部门都非常理解电子邮件如何成为动员支持和建构联盟的有效工具。信息技术进步给了反民主的反对组织新的工具，这一判断引发了一些有趣的反事实历史问题。

的策略和命运来获得洞识。

聚焦于多元主义、动员和意识形态，聚焦于在领土上分布不均的国家权力，以及新信息技术对于威权主义统治者及其反对力量的意义，将会更好地理解现代非民主体制的光谱。

参考文献

Bellin, Eva, The Robustness of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Excep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6, no. 2 (January 2004).

Bonner, Raymond, *Waltzing with a Dictator: The Marcose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olicy*,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88).

Buss, Claude A, *Cory Aquino and the 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 Palo Alto, CA: Stanford Alumni Association(1987).

Brooker, Paul, *Non-Democratic Regimes: Theory,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2000).

Brownlee, Jason, Durable Authoritarianism in an Age of Democracy. PhD Dissertation defend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Carothers, Thoma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1 (January 2002).

Carter Center. Nd. "Observing the 1997 Elections Process in Liberia." Atlanta, GA.

Case, William, Can the "Halfway House" Stand? Semidemocracy and Elite Theory in Thre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8, No 4 (July 1996).

Chehabi, Houchang and Juan J. Linz, eds, *Sultanistic Regim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

Collier, David and Steven Levitsky, 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 Conceptual Innovation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4 (July 1997).

Diamond, Larry,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

Diamond, Larry,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2: 21—35.

Hermet, Guy, Las elecciones en los regímenes autoritarios: Bosquejo de un marcode análisis, in Guy Hermet, Alain Rouquié and Juan Linz, *Para qué sirven las elecciones?* Me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Huntington, Samuel P,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Huntington, Samuel,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

Linz, Juan J,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pain, in Erik Allardt and Yrjö Littunen (eds.), *Cleavages, Ideologies and Party Systems. Contributions to Comparative Political Sociology*, Helsinki: Westermarck Society.

Linz, Juan J., Totalitarianism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Greenstein and Nelson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Macropolitical Theor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ress(1975).

Linz, Juan J.,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iation*,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

Linz, Juan J.,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Lust-Okar, Ellen, *Structuring Conflict in the Arab World: Incumbents, Opponents,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Mazzuca, Sebastián. Forthcoming, Access to Power vs. Exercise of Power: Reconceptualizing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Donnell, Guillermo, Democracy, Law,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6, 1 (Spring 2001): 7—36.

Posusney, Marsha Pripsten and Michele Penner Angrist, eds,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Regimes and Resistance*,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2005).

Schedler, Andreas, The Nested Game of Democratization by Elec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3 2002a, No 1: 103—22.

Schedler, Andreas, The Menu of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2002b, no 2: 36—50.

Snyder, Richard, "Explaining Transitions from Neopatrimonial Dictatorships," *Comparative Politics* 24, 1992 no. 4: 379—99.

Snyder, Richard, Paths out of Sultanistic Regimes: Combining Structural and Voluntarist Perspectives, in H. E. Chehabi and Juan J. Linz, eds., *Sultanistic Regimes*, Balti-

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

Snyder, Richard, Scaling Down: The Subn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6, 1 (Spring 2001): 93—110.

Thompson, Mark R, *The Anti-Marcos Struggle: Personalistic Rule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the Philippin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

West, Darrell M, *Digital Government: Technology and Public Sector Perform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Zakaria, Fareed,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76 (November-December(1997): 22—43.

建构政治正当性:选举民主还是政府质量*

博·罗斯坦**

"对美国好点……否则我们就把民主送到你们国家去!"如果人们在我的家乡瑞典西部的哥森堡开车行进,汽车偶尔会沾上写着上面这句话的红色保险杠贴纸。[1] 在这个好玩的口号背后的,是现在的普遍认知:布什政府通过引入选举式大众民主在伊拉克建构正当政治权威的努力,已经悲惨地失败了。尽管伊拉克人民已经投了几次票,投票率也高得惊人,尽管选举相当有序,并且至少就该地区而言公平得惊人,伊拉克政府一直没有能力把自己建

---

* 本文译自 Bo Rothstein, Creat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Electoral Democracy versus Quality of Governmen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9 53: 311—330.

** 作者系瑞典哥森堡大学 August Röhss 政治学讲席教授,罗素·赛奇基金会、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其英文著作有 *Just Institutions Matter: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Logic of the Universal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Creating Social Trust in Post-Socialist Societies*, edited volume with Janos Kornai and Susan Rose-Ackerman,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and *Social Traps and the Problem of Tru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他的学术文章可见于下述学术期刊:*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Politics & Societ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World Politic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作者注:我感谢耶鲁大学法学理论工作坊的参与者,尤其是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罗伯特·波斯特(Robert Post)和斯蒂芬·特列斯(Steven Teles)有价值的评论。也感谢吉苏尔·厄灵森(Gissur Erlingsson)、索伦·霍姆伯格(Sören Holmberg)、斯塔希斯·卡尔瓦斯(Stathis Kalyvas)、亨里克·奥斯卡森(Henrik Oscarsson)和简·特奥雷尔(Jan Teorell),他们的反馈也富有教益。

[1] See http://www. stickergiant. com/, click "social-political," "progressive," and "anti-Bush."